

# 人民日报

REN MIN RI BAO

1948年6月15日 创刊  
第6437号

今日要目

第一版  
文艺工作者下乡下厂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在斗争洪炉中改造自己促进思想革命化  
社论：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去锻炼！  
第二版  
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裕禄同志学习——“实现县委领导革命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讨论（专栏）  
第三、四版  
本报编者按语

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二月六日的反华声明  
比利时共产党《人民之声》周刊指出，卡斯特罗喊的是团结干的是分裂  
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桑穆加塔桑指出，卡斯特罗参加反华大合唱  
第五版  
对于卡斯特罗反华声明的反应  
第六版  
越南外交部声明谴责美机空袭老挝  
丰沙里和中国总领事馆

1966年2月

22

星期二

夏历丙午年二月初三

惊蛰：公历3月6日  
夏历二月十五

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晴  
风向 北转南  
风力 二、三级间四级

夜间 晴  
风向 南转北  
风力 二、三级

温度 最高摄氏零下2度  
最低摄氏零下9度

今日北京开印时间4时19分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全心全意同工农兵相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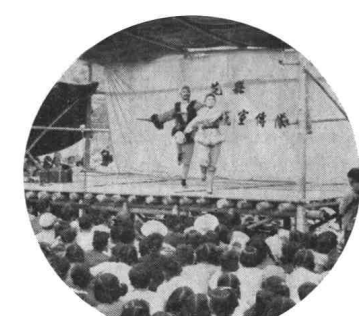
## 文艺工作者下乡下厂参加三大革命运动 在斗争洪炉中改造自己促进思想革命化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适应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新形势，各地文艺工作者正在形成一个到工农群众中去，参加实际斗争的热潮，以促进文艺队伍的革命化。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中，除了电影放映队等长期在农村活动的基层文化队伍以外，目前已经有十六万多名文艺工作者下乡下厂。

这批文艺大军是最近一年来陆续开赴农村、工矿生产第一线的，绝大多数在农村深入生活和斗争。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的则根据演出、创作等不同的任务和业务特点，采取工作队、专业演出队、创作小组和蹲点调查等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一边深入生活，一边开展工作。现在，大多数省市的文艺单位，上山下乡的人员都达到或超过了本地区、本单位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不少地区和文艺单位有半数以上的人员经常在农村和工矿活动。各地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工矿，从逐步走向经常化和制度化。在部队中，许多文艺单位都能做到经常有三分之一的官兵在基层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分之一的人到农村和工矿参加文化普及工作；另外三分之一的人留在本单位坚持日常工作。这样交替轮换，每个专业文艺工作者每年就可以有三分之一或一半左右的时间同工农兵生活在一起。

有关部队负责人在分析当前文艺工作者上山下乡的特点和意义时指出，这是解放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深远的又一次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也是文艺界毛主席著作、进一步同工农兵相结合、促进文艺队伍革命化的百年大计。这批上山下乡的文艺工作者中，包括各地文化部门的党组织和行政领导人员，以及文学、电影、戏剧、音乐、舞蹈、美术、出版、曲艺等方面许多著名的作者、演员、导演、编辑、演奏人员等。他们这次下去，不是去过有些人下乡只是为了“收集创作材料”，而是以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改造思想为主要目的。这次下乡的大多数人员一到农村，就直接深入到生产队或生产大队，坚持和贫农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怕脏，不怕累，真正放下架子，做贫农的小学生，一心进行思想革命，努力做到“人下乡心也下乡”。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深入生活过程中，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许多人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做镜子，随时对照自己，比对自己，想自己，找差距，学先进，广大职工和贫农中农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社会主义的“新风貌”和艰苦朴素的冲天干劲和踏实精神，使下乡的文艺工作者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同时，为今后在创作中表现社会主义新生活和社会主义新人积蓄着宝贵的思想和生活基础，他们用“雪中送炭，火暖自身”这句话，形容这次下乡所尝到的甜头。有些人刚刚从农村回来不久，就再度要求下乡，许多人常常亲切地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农村这个家！”

在深入生活、改造思想的同时，下乡下厂的文艺工作者还通过文艺演出、放映电影幻灯和图书发行等几个主要的渠道，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把文艺文化送到基层去，送到工农群众中去。许多过去比较集中在农村活动的专区、县一级的艺术表演团体和电影放映队，现在更合理地制定了下乡演出规划，力求使农村的干部和群众都能接触到文艺。不少过去下乡较少的县一级的文艺团体，也进一步面向农村，下乡下乡的文艺工作者在来信中写道，送下乡，开始被农民称为“庄稼剧团”，许多文艺工作者下乡下乡，一定要听党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全心全意到工农兵中去，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在群众斗争和革命运动中，把自己锻炼得更加充实，更加坚强。



文化部所属单位文艺工作者组成的一支文化工作队，到广东花县公社为农民演出，并且辅导群众业余文化活动。图为文化工作队为农民演出舞蹈《喜鹊的岁月》。新华社记者 潘家琛摄

社论

### 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去锻炼！

目前，全国大约有十六万文艺工作者下乡，下厂，下连队。这支文艺大军，跟工农兵同吃、同住、同劳动，为工农兵服务，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是解放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我们祝贺这支文艺大军为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作出新的贡献。

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最正确、最彻底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路线。这条文化革命的路线，要求文艺工作者革命化、劳动化，同时要求劳动人民自己的文化。文艺工作者革命化、劳动化的根本道路，就是深入工农兵，与工农兵相结合；特别是面向农村，为五亿农民服务，到农村去锻炼自己，改造自己。

现在，这十六万文艺工作者中的绝大多数，正在农村锻炼，有的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的参加文化工作队、专业演出队、创作小组等等。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今天，在我国农村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深入开展，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正在蓬勃兴起。五亿农民，特别是广大贫下中农，在农村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在改造旧的生产关系、发展新的生产关系中，发扬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表现出无私、公而忘私的崇高品德，涌现了大量的先进人物和新人。今天的农村，也是开展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重要阵地。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的火热斗争中，同广大贫下中农同呼吸，共命运，真正打成一片，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在劳动和斗争中实现自我改造，实现知识分子革命化、劳动化，就能成为农村的社会主义文化普及工作，作出自己的贡献。

文艺工作者在农村，跟广大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共同生活，并肩劳动，深切体会到贫下中农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立场，看到贫下中农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顽强斗争精神。他们受到深刻的教育，逐步坚定了改造自己，为工农兵服务，为五亿农民服务的决心。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农村斗争、生活的实践中，逐步提高了这种同农民结合的自觉性，是个良好的开端。

文艺工作者说得好：“要演好革命戏，先做革命人。”只有真正投身到工农兵火热的斗争中去，在斗争中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熟悉工农兵，学习工农兵，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在生活实践中进行艺术实践，才能写好、演好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才能真正以文艺武器为工农兵服务。正如毛泽东同志教导的：“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只有先走做学生后做先生，为了服务先要改造自己这一道路，紧紧地抓住自己这个中心环节，到农村去才能有收获，才能服务好。

过去，有些文艺工作者也下过乡，也到过农村，可是，他们往往只是为了“体验”生活，为了收集素材，而把自己置身于现实斗争之外；有的主观上也很热心去普及，但不考虑现实的内容是否有益；有的也很热心去普及，但不根据现实的需要与可能，忘记了文化不能脱离经济基础而孤立地发展，成为文化而文化。这些教训是必须记取的。今天到农村去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应该把深入生活，努力学习，参加劳动，改造自己放在第一位，不能把本身的工作放在第一位，更不能浮光掠影地“体验”生活，或者单纯收集素材。优秀的短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的作者，原来是演员，一九五八年才创作创作。这些年来，他经常下部队，一年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在部队；起初下主要是为了创作，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总写不出好东西来。为什么？他开始时认为是题材的问题，后来才认识到还是思想、生活不过硬，自己对兵的理解，不象兵对兵的理解那样深。从此，他下决心好好当兵，参加野营，跟战士一起干，身子下去了，心也下去了，思想感情逐渐和战士打成一片，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欧阳海之歌》这一部反映和歌颂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欢迎的作品，终于创作出来了。由此可见，只要认真改造自己，努力学习，一定会有很好的结果，一定会提高本身的业务，作出更大的贡献。

投身到广阔的农村革命斗争洪炉中的文艺工作者同志们：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大红旗，紧紧地打成一片，改造自己这个中心环节，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同他们同甘共苦，逐步懂得他们的心理，逐步懂得他们的爱憎，懂得他们需要什么或不需要什么。只要真正遵循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路线，坚持不懈，积以时日，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为工农兵服务的愿望，不仅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事业作出贡献，对整个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昌盛，也将起巨大的影响。

### 总政治部通知全军文艺体育团体 组织小型文艺队深入基层 当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最近发出通知，要求全军文艺体育工作者，坚决贯彻执行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关于部队文艺工作要组织小型文艺队，深入基层，为大多数官兵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指示，把组织文艺工作队当作一九六六年的工作要点。

通知指出，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的指示非常重要，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按这些指示去做，就可以更好地贯彻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工作指示，就可以在部队文艺体育工作中更好地突出政治，加强战备，贯彻执行林彪同志指示的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就可以更有利于使文艺工作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

通知要求全军文艺（队）、军乐团（队）、部队文艺队，一九六六年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除担任特定任务的文艺队外，所有人员一律组成文化工作队深入基层，于二月份开始分批陆续下去。文化工作队应高举毛泽东思想大红旗，学习好毛主席著作，当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具体任务是：演出、辅导、创作、服务、调查，并通过这些活动进行锻炼，更好地加深文艺体育工作者的思想革命化，丰富生活，促进创作，培养更多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文艺体育事业的革命接班人。文化工作队下去的时间应在半年以上。

### 靠集体智慧和力量开辟多快好省的道路

### 天津用大协作方法制造三种汽车

### 慕江齿轮厂同各地工厂协作制成二十五吨自动卸货汽车

天津市的具体情况，是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是依靠集体智慧、集体力量的道路。他们根据天津市这个老工业城市的特点，决定充分利用现有设备的潜力，采取按专业化协作的原则组织汽车生产。事实证明，这是一条多快好省的道路。

对于原来只能生产一部分汽车配件的天津职工来说，要在短时间内多快好省地制造出汽车，没有革命的精神和革命的方法是办不到的。

要建设“大而全”的工厂吗？不成！因为这样搞，既浪费国家大量投资，也不合理。采取集中一部分零件的生产，分散出一部分零件的办法吗？也不成！这样搞，不适合

大胜利。主管汽车设计的五名技术人员，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以大庆设计人员为榜样，打破设计上的洋框框、旧框框和烦琐哲学的束缚，深入群众，深入实际，采取“三结合”的方法进行现场设计。这样做的结果，及时解决了许多设计上的疑难问题，使设计工作进行得又快又好。

“红岩”牌二十五吨自动卸货汽车的诞生，也是全国各有关单位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全面进行生产技术大协作的结果。全国各地共有六十多个工厂企业承担了试制这种产品的协作任务。这些单位所担负的协作任务，一般都是按时或提前完工，质量规格符合要求。有的单位不仅为二十五吨自动卸货汽车提供了许多技术资料，还专门传授了生产技术经验，对保证重工业汽车的按期试制成功起了重要作用。

“红岩”牌二十五吨自动卸货汽车，比过去我国进口的同类型汽车跑得快，转向灵敏，制动灵快，耗油率低，检修起来也比较方便。这种新型汽车，是矿山生产、基本建设等运输量大的生产建设单位的重要运输工具。它的试制成功，为我国汽车制造工业增加了新品种，同时也培养和锻炼出一支掌握重型汽车生产的技术队伍。

慕江齿轮厂过去只能生产汽车配件，现在试制成功二十五吨自动卸货汽车，是工厂职工同兄弟工厂职工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天津市汽车工业的发展，是依靠集体智慧和力量，也是依靠有关单位和有关集体力量的支持。在试制过程中，不仅得到天津市各工厂、科学研究所的大力帮助，而且还得到北京、上海、南京和唐山等城市的大力帮助。

新华社重庆九日电 国

### 北方地区下了大雪

北方地区下了大雪，这是入冬以来第一场大雪。据气象部门统计，这次降雪范围很广，覆盖了北方大部分地区。降雪量在十厘米以上，部分地区达到二十厘米以上。这次降雪对农业生产有利，可以增加土壤墒情，有利于越冬作物的生长。

这次降雪对农业生产有利，可以增加土壤墒情，有利于越冬作物的生长。同时，降雪还可以减少病虫害，对林木生长也有好处。但是，降雪过多也会对交通和电力供应造成一定影响。有关部门提醒市民注意防范。

这次降雪对农业生产有利，可以增加土壤墒情，有利于越冬作物的生长。同时，降雪还可以减少病虫害，对林木生长也有好处。但是，降雪过多也会对交通和电力供应造成一定影响。有关部门提醒市民注意防范。

这次降雪对农业生产有利，可以增加土壤墒情，有利于越冬作物的生长。同时，降雪还可以减少病虫害，对林木生长也有好处。但是，降雪过多也会对交通和电力供应造成一定影响。有关部门提醒市民注意防范。

### 加纳新任大使贝迪亚科·波库

### 向刘奇主席递交国书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加纳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贝迪亚科·波库，今天下午偕同大使馆外交官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奇递交国书。

递交国书后，刘奇主席同波库大使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在场的有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等。





## 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二月六日的反华声明

（上接第三版）

只从我国对外贸易部的材料和古巴对外贸易部的材料之中有一个质的不同，那就是古巴在古巴进行分析的六年中的三分之二时间，即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所使用的材料——这些材料能够真实地表明古巴交换发展节奏——是精确地根据实际到达或离开古巴的商品的；而中国方面的材料则完全无视这一点，是依据这样一个异想天开的意见的，即：“一张纸上议定的商品单于比真正到达一个国家或另一国家的商品更有价值。

这些商品有时是超过议定书规定的数额的，一九六二年就是这样的，那一年议定的是六千二百吨（比索），而收到的则是八千九百八十吨（比索）——这才是真正令人感兴趣的材料，而我们算进了我们的数字中。另外几年，如一九六一年，向古巴进口的议定数额是一亿零八百万（比索），而实际到达的进口额则为九千八百六十万（比索），这才是令人感兴趣的材料，我们就是这样计算的。

相反，一九六六年，不存在要收到的商品超出协议额的任何可能，因为中国方面断然宣布——这是以前任何一年都没有发生过的——所提供的（商品）数量是最大限度和最后确定的。

中国方面提出不同类别为理由，显然是居心险恶，以便蒙蔽外人。掩盖他们的立场的弱点，使人们认为古巴对外贸易部不负责任地玩弄数字。

我在二月二日的演说中同样说过：“……我考虑到如下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平均每人每天消费量很高而食糖消费量很低，我自己考虑到下述事实，同古巴相比，在中国每给居民的食糖比之古巴高三四倍，而在古巴，大米的价格比糖高一二倍，我更多地用食糖交换大米而得到两国都同样有利。因此，我向他提出了据我看来自一个国家对两国都有利的事实：我们准备用两吨食糖交换中国给我们的每吨大米。

“正如我对你们说的，我是考虑到一系列的情况而提出这一建议的，其中考虑到国际分工的原则，考虑到这样的事实，我们是种植甘蔗的国家，我们是食糖生产者，我们是善于种植甘蔗的国家，我们可以从每公顷甘蔗中得到很贵重的食糖，而我们的大米的情况不是这样的，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同样的经验，没有大量的水，没有巨大的河流，没有最适宜于种植水稻的广大地区，我们没有最好的技术，我们没有最好的品种的种子，而甘蔗的情况正好相反。”

我还表示：“应该谈，可以谈，回答高于我们的期望。他们接受了提议，他们甚至提出，那一次我们说的那种方式进行交换，而他们继续付给食糖同样的价格，我们也对大米继续付给同样的价格。”

关于这一点，他们否认了什么呢？他们否认所建议的交换比例确实是二比一，而是三比二。关于这一点，古巴对外贸易部又说得十分清楚：“一九六四年七月在哈瓦那就一九六五年贸易议定书开始了会谈，这是随后在北京要继续会谈的初步会议。

“中国方面已经同意在那一年供应我们十五万吨大米，这比一九六四年的数字（十三万五千吨）稍有增加。古巴在一九五五年得到十五万吨大米，价格随品种不同而异，每吨在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五比索之间，用来交换的将等价的约六万五千吨糖，价格按定为每磅点一一分。

“正是在这时，古巴革命政府总理建议用大米交换糖的贸易，正如新华通讯社在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三日发表的声明中说，用三十二万吨糖交换十五万吨大米，也就是提供十五万吨而我们是二十万吨大米。古巴不是提供十六万吨而是二十七万吨糖。从算术上来说，古巴应多提供二十万吨食糖，来换取多提供的十万吨大米，如果这种算法不错，那就是说我们恰好好了是二比一。”

“因此，总理说古巴的建议提出在两吨糖换一吨大米的基础上增加交换大米的贸易，那是绝对正确的。”

中国政府说这些无可争辩的论点和材料回答说，“古巴对外贸易部有了很大的力气，编造了一些莫名其妙数字，证明卡斯特罗总理所说的古巴用两吨糖换中国一吨大米的话是绝对正确的。

看来，对中国政府来说，把数字简单地加一下要花很大的力气，对他们没有好处的数字就是莫名其妙地数字。中国政府所犯的错误是由于他们分析数字时丝毫没有考虑到头批的十五万吨大米定下的价格约等于十六万五千吨糖的价格，也就是说是二比一比一点一，这是早已计算好的，当时我建议将约十六万五千吨糖增加到三十七万吨，也就是说，多提供十六万吨大米来换取多提供的十万吨大米（比例是二比一），这个数字加上按我们的协议规定的数额，就是说古巴将得到的总产品的数量是二十五万吨，他们仅限于比较总数，但是，不论他们用什么标准来分析这些数字，下述事实是改变不了，即他们只向古巴多供应十吨（吨）大米，就可得到十万吨五千（吨）糖。难道他们能否认这个建议对中国是十分有利的吗？

然而，所有这一切的实质是如下几点，他们也已经不得不承认以下几点：

（一）古巴政府在一九六四年底提出了一项以糖交换大米的特点建议。

（二）古巴建议是以提供比原来规定的等价数量更多的糖来交换大米为条件提出的。

（三）由于这一建议，他们同意提供二十五万吨大米。（四）正如我在二月二日所说那样，他们同意了提供我们所要求的大米，然而没有接受一个比原来规定的较高的糖的价格。

古巴政府如何解释了中国的答复呢？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能不认为这是对中国的一个肯定的答复。在我们的提议中我们明确地表明了我们对这种国内消费中如此重要的产品的每年需要量。

当时我们认为，拒绝作为相应给予而接受较高的糖的价格，是和我国政府在与它的所有重大合同中所一贯采取的合作精神一致的，而我们从未有过认为，这就是拒绝承担供应我们每年最低限额的义务。

中国政府现在对这个问题解释是，这只是为期一年的照顾，而这种解释与我们的建议完全一致。这种解释表明了他们办事时机棱两可的态度，这是一种对古巴方面的诚意的敷衍行为。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中国政府竟象撒罗姆把匕首一样，完全单方面地保留对他们所承担的义务的限度的解释权，事先根本没有打听过，也没有经过讨论，而这恰恰发生在我国没有条件也没有办法在别的地方上买到大米的时候。

由于中国政府方面突然地急剧削减对古巴的大米出口，我们不得不规定这样一个定量。关于这一点，中国政府在它最近的声明中是这样说的：

“……古巴是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对居民实行每人每月六磅大米的基本供应的。这一年我国对古巴的大米出口量是十二万吨。其后，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我国每年对古巴出口大米三十五万五千吨，古巴居民的大米供应量没有变动。一九六五年我国对古巴的大米出口量几乎增加一倍，古巴居民的大米供应量也没有因而增加。一九六六年，根据双方年初商谈的数字，我国对古巴的大米出口量减然是比一九六五年减少了，但仍高于一九六二年，而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相等。在这样说来面前，怎么能把古巴少对居民的大米供应数量，硬要同中国贸易问题联系在一起呢？”

我们不可能不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知耻的。中国政府不会不知道，在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古巴还从其他市场得到粮食；由于我国的封锁，我们在许多可能的供应者方面得到越来越大的经济性困难，除了墨西哥以外，没有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同古巴进行贸易；那些没有断绝往来的国家，如乌拉圭和其他一些国家，在帝国主义于一九六四年七月在华盛

顿举行的协商会议上颁布了美洲国家组织的决议之后，也这样做。在那次会议上，在指控古巴向美国内瑞拉等国家运送武器的罪名下，采取了反对古巴的措施，结果，这些国家被迫断绝了同我国的外交、领事和贸易关系。

此外，为了我们在所能的少数几个地方得到大米，我们的购买由于所谓世界市场的食糖价格而受到了限制。中国政府不可能不知道在所指的的那几年中食糖价格是多少。根据伦敦交易所累积平均价格，价格情况如下：

一九六二年——离岸价格每磅二点八（美）分  
一九六三年——离岸价格每磅八点五（美）分  
一九六四年——离岸价格每磅五点八（美）分  
一九六五年——离岸价格每磅二点一八（美）分  
一九六五年最后五个月的平均价格如下：  
八月——八点七（美）分  
九月——八点三（美）分  
十月——二点零八（美）分  
十一月——八点八（美）分  
十二月——二点零四（美）分

就在价格这样坏透了的这一年十二月，我们的对外贸易部收到了意外的消息，即中国政府将比上一年少提供十一万五千吨大米，而且比需要量少于一十四万五千吨，古巴政府怎么能够避免食糖在九一九六六年的大麻烦呢？

中国政府的这一能够硬要不顾这些实际情况而毫不脸红地断言：“如果古巴方面确实由于对外关系方面的困难，真心希望我们在一九六六年多向古巴出口一些大米，它完全可以象过去一样，在高一级的谈判中提出来。”

自然，古巴政府——正如我在后面要解释的一样——是有充足的理由不这样做的，在解释这一点之前，我要问：如果古巴政府，知道中国人民的食糖需要量是六十万吨，象他们的代表向我们代表团所表示的那样，他们回答说，他们想把食糖降低到三十二万吨，因为我们需要出售食糖来获得用来购买各种粮食的外汇，那么中国人民将会有什么感想？但是，尽管古巴遭到了最近六十年来最严重的旱灾，它的（糖）产量将不是等于去年，而是比去年少，最厉害的是其它市场上的货物已达到了最近几十年最低的水平，而美国帝国主义加强了对我们封锁，但是，我们不是（把供应量）减少到三十万（吨），而是建设提供八十万（吨）。

我们缺少了却提供更多，而您们大多少了却提供更少，我们在交欠、封锁和低价的情况下却增加我们主要的贸易产品的数量。您们承认获得了丰收，却对我们几乎减少了将近百分之十五的大米来文交换。

此外，中国政府的代表们辩解说，必需进行大米储备以为美国一些发动侵略做好准备。难道这不是正在面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的或更大的美国侵略的危险吗？在一次侵略中，如何能把一粒粮食运到离何社会主义国家好几十千哩的我们的海岸呢？古巴用什么方法，通过什么国境能得到好供应呢？

根据中国政府关于国际主义的概念，象我们这样一个在军事上比较薄弱、比较容易遭受侵略的国家的，没有权利考虑储备的，甚至没有权利保持在前帝国主义时期的传统情况上所被迫规定的一个微弱的供应储备。

我们没有把这种份额的减少完全归咎于中国政府。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帝国主义负有首先责任；其次是我们政府，因为它实际上参加了这一封锁；第三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相信了美国政府的国际主义精神。

但是，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中国政府在它一九六五年的声明中说：

“中古两国的贸易谈判到年尾，在谈判中出现过这样或者那样的不愉快现象也都有存在。卡斯特罗总理提出在古巴没有取过现实的做发，有什么可能是在一九六四年国际团结在哈瓦那召开的年，卡斯特罗总理却突然采取这种异乎寻常的做发呢？这是值得人们很好想一想的。”

中国政府在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日的声明中，则更加冒险地坚持说：“我们仔细地研究了古巴对外贸易部的回答，我们认为它没有回答我们在一月九日谈话中所提出的中心问题，那就是，中古两国一九六六年贸易的初步谈判仍在进行，古巴政府如有不同意见和要求，完全可以向中国政府提出来，为什么卡斯特罗总理突然在亚非拉三洲人民团结会召开前夕，单方面地不真实地公布谈判情况呢？”

在一篇声明的最后，它怀着最恶毒的意图，重复四倍的含沙影射、诡辩的、恬不知耻的思想说：

“如果古巴方面确实由于对外关系方面的困难，真心希望我国在一九六六年多向古巴出口一些大米，它完全可以像过去一样，在高一级的谈判中提出来。可是古巴在我们两国对外贸易部代表团的初步谈判仍在进行的时候，就单方面地不真实地公布谈判情况，并且把古巴所欠的大米供应量的责任推到中国头上，这确实使我们不能不怀疑古巴方面这样做的目的另有所在。”

它又继续坚持同一个思想，它这样似乎就是当时我们两国的美商同我们完全一样，似乎这种关系——一直处于最大的和谐中，似乎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谈判之前根本不会发生严重扰乱了这种关系的严重事件，因而古巴政府的立场是没有道理的，莫名其妙，不正常的，可疑的；是最大地制造出来的一个圈套，别有用心。天晓得他们别有用心！它企图以蒙头鸟的恶毒凶恶、含沙影射的、狡猾、诡辩的手法散布怀疑。

提出这个论点是十分居心险恶的，因为中国政府打算利用某些新闻来公开这种用来企图迷惑人而混淆视听。如果考虑到，古巴政府本身并不想取毁谤这些问题的确凿证据，这种做发就产生令人怀疑，我在二月二日的演说中严厉地进行了谈责，使我国产生困难，没有评价任何人的，也没有更严重地谈这个问题，如果由于如果不得不宣布以前发生的其他更严重的问题，那么令人十分伤心和十分不愉快的、过去发生的那些问题十分清楚地说明中国的行为的不道德性。

同时，中国政府说什么一月二日即约周三大会会议有什么联系，似乎这不是我们庆祝我们共和国节、庆祝一九六五年庆祝的胜利，每年的这一天我们都同人们一起举行群众大会，谈论国家的重大问题。它企图完全无视这个巨大的性质，完全无视我们应当同人民说清楚将出现的困难这一事实。这一切三三大会会议完全没有关系。

正是我们可以说，恰恰在这次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团结会议的前夕，由于气候不好，由于我们的主要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价格特别低而遇到严重困难的一年，在帝国主义阻挠或阻止我们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进行贸易的严重经济封锁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对我们进行了一次经济侵略的罪恶活动。中国政府选择到更适当、更合适的时机来给予我们人民的严厉打击了，尤其严重的是，这正好发生在即将举行三大洲人民之间的团结会议的时候。这确实使值得人们认真地想一想。

我们下面要谈的话，我们本来在一月二日就可以说了，本来当时就可以解释中国政府这种行动的行动。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恰恰是这个政府的背信弃义、伪善、恶毒的影射以及对这个我们小国的轻蔑使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在贸易会谈开始前三个月，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上午十点，共和国总统奥斯科瓦尔·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同志和我，作为政府总理的身份，召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讨论我们认为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尽管中国政府完全清楚知道，关于在两国散发有关政治问题的宣传材料，特别是有关那些加深社会主义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分歧问题的宣传材料一事，我们采取什么立场，因为古巴政府就这方面向我们们表示过意见，甚至公开说过，但美国中国政府在古巴的代表们完全不懂我们这方面的要求，不承认作为主权国家只属于我们自己的权力。

古巴政府的这一立场已在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三日（哈瓦那）大前十分明确地说明了。在那里，我们很好地详细叙述了我们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和帝国主义对越南的侵略的意见。

那次，我们明确无误地说明：

“不依靠数百万的军队的力量，不依靠原子弹力的我们这个小国，我们象越南和古巴这样的小国，没有可能平静地得到任何援助，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这些分裂和分歧对我们比对我们人影响更大，我们的处境特殊，这里美国这个帝国国九十二，那就要受到美国飞机的袭击。

“问题不在于在理论和哲学的范围内分析有争论的各个问题，而是需要考虑到这一伟大的现实：面对一个进攻性的敌人，面对一个日益增强的侵略的敌人，分裂是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的，分裂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分裂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从世界上出现第一个革命者，从革命成为群众本能能参加的社会现象起直到它地进行进行，革命成为人民完全理解的任务和现象（这种情况是当马克思主义出现时发生的），在历史的任何时代，在人类的任何时期，在敌人面前的分裂从来都不是是正确的战略，从来都不是革命的战略，从来都不是明智的战略。

“在这个革命过程中，我们所有的人从一开始就受到这个思想的教育：一切分裂的东西都削弱力量，一切破坏团结的东西对我们人民来说都是坏事，而对帝国主义是好事。我们中国人民从一开始就懂得必须团结，团结是革命的基本问题，团结是群众的要求，团结成了全体人民的口号。我们要问，难道帝国主义已经消失，在人类的任何时期，在敌人面前的分裂从来都不是正确的战略，从来都不是革命的战略，从来都不是明智的战略吗？”

“他们要使谁懂得，他们要使谁相信，分裂是有利的，分裂是有利的？难道他们没有看到帝国主义在那里取得进展吗？难道他们没有看到帝国主义有在那里执行战略吗？难道他们没有看到帝国主义者为扑灭越南南方的革命运动在那里执行战略吗？帝国主义者在先援军的借口下空袭越南北方，然后利用有权在高空时对付越南北方进行攻击，并继续利用大量飞机对付越南南方的战士。

帝国主义保留着进行自己尽可能最大限度地这种空袭的权利，他们使用几架飞机进行轰炸，以后再用武装飞机直升飞行，被他们轰炸的飞机驾驶舱。毫无疑问，帝国主义者希望进行一种非常舒服的战略。

毫无疑问，帝国主义者希望进行一种只丧失某些工业品、因丧失一些飞机的战略！毫无意义啊，越南南方人民和越南北方的人民正在经受着这一切！他们亲身受到这种痛苦，因，在那里，无论是南在北方是北方，男人和妇女都在死亡，这些人是血腥的牺牲品，是美国帝国主义的牺牲品。

他们还毫不谨慎地宣布，他们打算继续进行这一切，因为，甚至是对越南北方的袭击也没有能摧毁社会主义大家庭内部的分裂。谁能怀疑，这种分裂使帝国主义者感到鼓舞呢？谁能怀疑这一点，即一个对帝国主义敌人的统一战线会使它行动，使他们在进行冒险行动和在世界的部分地区实行愈来愈大的干涉之前会去加障碍不决定进行考虑呢？他们能使谁相信这一切呢？他们用什么办法，用什么逻辑来做到这一点？从那里得到好处的是谁呢？是帝国主义者！受害者是谁呢？是越南！谁蒙受了打击呢？是社会主义的愿望，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 International 运动的愿望！这必然使人们感到真正的痛心。因为，对我们来说，解放运动不是一句空洞的人的空话，而是我们的确一贯感受到的口号！”

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国，我们并不想成为世界的中心；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国，我们并不想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当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十分真诚，绝对大公无私的，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不是在我们阶级选举中得到授权，而是通过手持选票进行选举的，我们是以六年来决定不，不动地地支持了帝国主义者的陷害和威胁的人民的名义这样说的：是以这样的人民的名义说过的：他们在为了加强革命保卫，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坚定不移地反对帝国主义，保卫革命方面毫不动摇。当我们在我们的祖国，在我们的国土上，使我们的人民从来没有放弃过自由的、绝对的权力，来采上，我们永远都不会向侵略者给过任何行动，同敌人我们的土地，安置核武器给导弹时，这个人民不可能是动摇了核热核弹，对我们发动核攻击的危险！此外，我们不仅同意运来导弹，而且我们还不同意走军走弹！我认为，这对谁都是完全不是耻辱。

我们代表人民说，我们是一个不接受美国佬的贷款、也不接受那种用于和平的粮食的国家，我们同帝国主义在政治上没有丝毫的联系，也就是说，在革命的信念和真诚性方面谁也没有教导我们，谁也没有教我们！就象谁也没有给我们的人民一九五五年和一九八八年的解放者指出独立和尊严的道路一样，我们是从发第一个和第二个哈瓦那宣言的人民，这两个宣言我们不是从任何文献中抄来裁的，它们是我国人民深刻的革命精神和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的纯洁的表现。

因为这是我国革命的感情，这是我国革命在所有必须证明的场合得到证明的思想，是毫不犹豫地、毫不变节、毫无任何矛盾地得到证明的思想。我们有权问——这象许多其他各国人民不得不问一样——这些分歧对谁有利，难道不是对我们的敌人有利吗？

当然，我们是有充分的权利，有绝对充分的权利——我认为谁也不会怀疑这种权利——把这些分歧和这些背约干廷式的斗争从我国和人民内部排除出去。

最好要知道，是我们的党在这里宣传！我们的党在这里制定方针！在这里，这是涉及我们权力范围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希望引起不和和摩擦来对我们产生儿来——因为我们不愿意——的话，谁也不能引起不和和摩擦来运进来！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引起敌人就是美国帝国主义！我们唯一不可克服的矛盾就是美国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我们准备竭尽全力与斗争的——斗争就是帝国主义。

我们的立场是——我们主张给谁一切必要的援助！我们主张——用武器、用武器和金钱进行这种援助！我们主张社会主义阵营为越南必要而战的危险！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在任何严重的国际纷乱中，我们都是帝国主义第一批的受害者目标之一，但是这并不使我们们担忧，我们从没有为此担忧。

这就是我们十分坦率、十分真诚的有根据的公正的立场。这个立场的出发点是我们有思想的权利，有判断的权利，有采取我们认为最正确、最革命的道德和行动的合法、不可侵犯的权利，谁也不要幻想可以使我们上革命者的课。

我们希望不要犯错误和无视我国人民的气氛的错误，因为这种错误使帝国主义人犯了一大堆，它的特点之一是蔑视其他人的，蔑视和低估小国人民。这个帝国主义犯了低估我国革命的人民的人的巨大、非常大的错误。如果其他的人也犯类似的错误，那是一个不道德的。

## 卡斯特罗二月六日发表反华声明以后古巴宣传机器掀起反华歇斯底里

报纸大肆煽动，电台日夜广播，千百次重复卡斯特罗对中国的诽谤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哈瓦那消息：在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二月六日发表反华声明以后，古巴开办了它的全部宣传机器，在古巴掀起了一阵乌烟瘴气的反华歇斯底里。

古巴报刊普遍用煽动性的标题刊登了卡斯特罗的反华声明。古巴共产党机关报《格拉玛报》在第一版以整版的篇幅，用五万五千个字的字体，刊登了其二万二千字中国的文字标题是：《菲德尔对美国政府声明的回答，中国政府背叛了古巴人民的信任，实际上参予了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封锁，应当说明真相：中国明明白白地完全是一个反华帝国主义的国家的感情。》其中“中国政府背叛了古巴人民的信任”这一句占四分之一版的版面，所用的字体，比《格拉玛报》反华的字体还要大。

与此同时，哈瓦那电台日夜反复广播卡斯特罗的反华声明，千百次地诽谤中国。接着，在以后的几天里，又连续播送各种攻击中国的消息。

我们的真诚的过去和现在都是在都国政策的，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将来我们也不是任何人的卫星国！

对我们来说埋伏的危險很大，但是不能利用古廷式的分歧和学说的诡辩来对付它，不能！而要利用革命的坚定性、革命的顽强性和进行斗争的决心来对付它。不能靠分裂的革命者、互相猜忌的革命的者和互相攻击的革命者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有地对付帝国主义敌人，而要靠革命队伍的团结一致来对付帝国主义敌人。对于那些不相信这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正确的策略的人，我们对他们说，对我们来说，在那里，在我们的岛屿上，在我们的领土上，在离帝国主义势力九十二哩的第一道战壕里，这正是正确的策略！

我们将按照这种想法来调整我们的路线，调整我们的行动。

不顾这个绝对明确的立场——这是我国人民的意志和我们要遵循的路线的毫不含糊的反映——中国政府，直接从中国或通过它的外交代表们，对我们增加了宣传的寄送和更加大批散发。

革命武装部队九月十二日报告说，中国政府的代表们一直在古巴革命武装部队的军官中大量地有系统地散发这些材料。这种宣传品寄到革命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各军的参谋部、各兵团参谋部、各师参谋部、各兵种的领导机关的参谋部、各政治部的负责人，并且在许多情况下用私人地址直接寄给我国武装部队的军官们。

有时候，中国代表们企图直接同古巴军官们进行接触，有时候，他们竟和军官们接近，其任务显然是争取个人，目的是活动宣传，或者也许目的是搞情报。

同这种大规模的宣传活动相反，在许多政府文职官员中也这样大规模地散发宣传品，尽管没有这些人的负责的程度。这真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事实，没有一个主权国家，没有一个有自尊心的政府会容忍这样的事情；这是对在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在非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应该存在的最起码的有礼貌的、有原则的明来自持的破坏。我国的革命国家不能允许，通过背叛我国用来保持任何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允许的信任、友谊和兄弟之情的活动来制造阴谋事件和干预干部们的类似企图。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九月十四日我们不得不用最强烈的言词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办——因为我们的大使不在——表示我们的愤慨，我们的抗议和我们关于停止这些活动的要求。我们很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政府的这位代表说，这种手段和做法，同美国驻我国大使馆过去在全国干预古巴内政和用这种和那种方式把它的意志强加给这个民族时，所使用过的完全一样；我们国家已摆脱了那个把我们海洋十公里、南边的古巴人取得解放，它不准备允许一个强盗从二万公里以外把类似的做发强加给我们的！我们坦率地认为中国政府的这种态度破坏了我国的主权和损害了在我国境内完全属于我们政府的特权；不要付太多大代价，我们政府内准备容忍这类事情。

在以充足的理由和强烈的限定的言词广泛地阐明了这几点以后，我们在与中国政府有紧密联系的分子在世界各地进行进行的诽谤古革命的运动表示了我们的抗议，我们从现在来看，这种诽谤使得中国代表们不尊重我们大批散发排入政治问题的宣传品提出的要求一事更加严重。

尽管最明确和断然地提出了这一警告，中国政府及其代表以至高无上的傲慢无礼和完全蔑视我们的态度导致了八百多份载有这些宣传文件的新闻公报，以便在古巴散发。

在上述这次会谈以后，达到的有：
九月份：三十七期新闻公报二百份
三十八期新闻公报一百九十四份
三十九期新闻公报三百八十八份十六份
十月份：四十四期新闻公报七百四十四份四十八份
四十一期新闻公报六百六十八份一十六份
四十二期新闻公报七百四十八份四十八份
四十三期新闻公报一万零四百三十三份
十一月份：四十四期新闻公报七千一百四十八份
四十五期新闻公报二千六百七十一份
四十六期新闻公报二千二百零四份
四十七期新闻公报二千六百六十八份
十二月份：四十八期新闻公报二千二百七十四份
四十九期新闻公报九百一十一份
五十期新闻公报一千五百五十一份
五十一期新闻公报一千三百一十一份
五十二期新闻公报一千五百五十九份
一月份：第二期新闻公报一千零七十九份
第二期新闻公报一千零七十五份
第三期新闻公报一千二百份

在共和国总统和政府总理直接和亲自提出警告后，从外向古巴寄来的新闻公报的总数是：五万八千零四十一份。

同时，那天之后中国驻古巴代表们印刷和积累的数量份其他新闻公报和政治性材料也散发了。

同样，有关宣传材料源源不断地送到武装部队参谋部、各军参谋部、各兵团参谋部、各师参谋部、各兵种领导机关参谋部、政治部负责人那里，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九月十四日已经通知我们，他们将向中国的政府汇报并且对提出的问题作出答复。（我们）完全没有得到中国政府方面提出的解释，它继续进行它的活动，当我们贸易代表团抵达哈瓦那时讨论一九六六年的贸易时，它由于纯粹的政治原因而而来的野蛮的经济恢复的形式作出非常不清晰和清楚的答复。

当然，这种活动将会停止。

一旦说明了对我们的权利，我们就有权问：既然从一开始我们就了解了中国方面在贸易谈判中的明显的讹诈勒索活动，中国政府怎么能企图使古巴政府屈辱地向更低一级提出请求，恳求他们给我们贷款，接受我们的八十万吨吨糖呢，再给我们十一万五千吨大米，象前几年一样接受我们的贸易必需品呢？

中国政府这样的企图，只能被解释为完全敌视我国的表现；完全无视我国人民性格和尊严的事实，已经不是大米多少的问题，不是也要到影响的多少平方里的布匹的问题，而是对各国民众作为重要和有根本性的一个问题，不是是在明大的问题上，强大的国家就能有权对别国的人民进行说教、勒索、施加压力、侵略和扼杀；不是是在革命者为之奋斗的明天的世界上，从存在阶级社会的世界以来，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君主专制，资产阶级国家以及现代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上使用过的那种最卑劣的海盗、压迫和帝国的手段在盛行下去。

古巴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



# 对于卡斯特罗反华声明的反应

##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评论

莫斯科电台如获至宝

两天内十七次转播卡斯特罗反华声明

莫斯科电台华语节目二月八日和九日摘要广播了卡斯特罗二月六日反华声明，共播十七次。现将八日广播内容刊登如下，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都知道，一月份中国报纸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声明，中国领导人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向古巴供应过去商定的大量粮食一事发表了谈话。二月六日，古巴总理卡斯特罗发表声明答复中国负责人的谈话。现在就请听卡斯特罗同志声明的简短摘要。

卡斯特罗同志说，中国政府通过这个国家对外贸易部某官员做出的声明是极端阴险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绝不会相信，在中国对外贸易部某某一个不知名和默默无闻的工作人员竟会发表谈话，把同一个保持正式商务和外交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理说成撒谎者，并有意于这一声明的政治内容和不恭敬的形式而使两国之间的关系——目前指的是古巴和中国的关系——严重地被乌云笼罩。

卡斯特罗同志在他的声明中援引了大量官方资料说明中国方面为了削弱减少社会主义古巴的贸易额而引伸的论点是以至曲解事实为基础的。卡斯特罗同志把中国政府就古巴居民大米供应量提出的论据称为不可信的。大家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说，尽管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中国增加了对古巴的大米出口，古巴居民的大米供应量并没有增加。有鉴于此，总理列举了一系列资料，谈到了也向其购买大米的墨西哥以外，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在美国的压力下，同古巴断绝了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谈到联合国在世界市场上跌落，从而影响到国家购买其他产品。

卡斯特罗同志在谈到一九六六年的中古贸易协议谈判时说，我们拥有数量较少的糖却供应大量的供应量，我们拥有数量较多的大米却提出较少的供应量。我们在干旱、封锁和低价的情况下建议增加我们主要贸易产品的供应量，你们承认获得丰收，却把大米供应量减少到将近百分之五十。卡斯特罗同志说，中国政府事实上加剧了对古巴的封锁。卡斯特罗同志又说，今年古巴大米大量所以减少，我们并不是归罪于中国政府的责任，责任首先应当由把军事封锁强加于我们的美国帝国主义者承担。其次由事实上加剧了这一封锁的中国政府承担，最后应由相信了中国政府帝国主义精神的我们自己承担。

卡斯特罗的声明中，大量篇幅谈到古巴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分歧和帝国主义对越南的侵略所持的立场。他说，谁怀疑这一分歧鼓舞了帝国主义者，谁会怀疑面对帝国主义敌人统一战线会迫使他们动摇，迫使他们在开始自己的帝国主义进攻之前，开始他们在世界这一部分日益明目张胆的武装干涉之前好好地考虑一下。卡斯特罗同志指出，分裂只会使社会主义的愿望受到挫折。

古巴总理在声明的最后说，中国政府的蓄意只能解释为完全不尊重中国，完全无视中国人民革命的性质和实力的证明。这里所谈到的已不是吨数较多或较少的大米，不是业已被减少的平方米较多或较少的纺织品，而是对于人民主要需要得中的问题，这就是大明天下的世界是否愿意赋予自己以经济、勒索、施加压力、攻击和扼杀我们小民族的权利。海盗行劫、压迫和去走私这样一些自从出现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君主专制和资本主义国家——以来存在着的并存在于现今世界帝国主义制度中的恶毒的手法，是将在革命者中按其确立而斗争的明天的世界历史地位问题。

捷克布拉格伏克报纸发表评论

说卡斯特罗反华“完全有理由”

《红色权利报》二月七日以《卡斯特罗拒绝中国的声明》

## 美国报纸和通讯社的评论

说卡斯特罗反华是“古巴政策的一个里程碑”；说他用“大骂中国人”来“酬谢”苏联；说这种做法也可能是“为使共产党世界公开分裂成两个独立的敌对阵营作准备”；认为必须等待卡斯特罗的“好戏中的下一场”；宣传卡斯特罗对中国的蔑视“不一定是在说谎”

美联社二月六日从哈瓦那发出的报道说，卡斯特罗指责共产党中国同古巴的贸易方面使用勒索办法，从而使得古巴同中国的关系几乎濒于破裂。

合众国际社二月六日从哈瓦那发出的消息说，菲德尔·卡斯特罗今天以通常对美国使用的那种愤怒的字眼指责中国在一笔引起争议的糖块大米的交易中“背叛了”古巴，为美国对这一岛屿的封锁出力。这是卡斯特罗对中国人怀有的最为强烈的抨击。

《华盛顿明星晚报》二月九日发表了一篇社论，摘要如下：菲德尔·卡斯特罗对毛泽东政府的大肆攻击使人毫不怀疑，他在莫斯科同北京的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已经同莫斯科命运相连。当然，他像往常一样。他的生存要靠苏联继续提供援助。这种援助每年为一百万美元左右。如果这种援助切断了，他怎么办？显然，中国产生反华及其落后的经济不能使卡斯特罗获得他从苏联得到的那些慷慨援助。北京决定停止向哈瓦那的大米交换糖块协议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菲德尔对此大发雷霆，说这是毛氏政权为了“美国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

无论如何，菲德尔已经指责中国共产党人为讹诈者、勒索者、进行颠覆活动的侵略者、仇视工人、大儒主义者和掠夺者，并争取美国理想主义在全球胜利的事业的背叛者。这种批评使人觉得，卡斯特罗可能很快断绝同北京的外交关系。如果他说得这样，那么这种预示着手和莫斯科也将分道扬镳，因为莫斯科能够指挥菲德尔的一切行动。

《纽约时报》二月十日刊登了理查德·埃德森的一篇文章，题为《古巴：在扩大叛乱》，摘要如下：菲德尔·卡斯特罗星期二谴责北京以后，古巴在加剧它同共产党中国的激烈斗争。

人们普遍认为，卡斯特罗这次演说是古巴政策的一个里程碑，其重要性仅次于它同美国决裂以及同苏联结成联盟的行动。

令人诧异的是，古巴的指责的激烈和严重——卡斯特罗对中国的指责之一是说他他们企图拉古巴军官当间谍。更值得重视的是，正在国内大事宣布这种指责。

到目前为止，古巴的官方不让它在其共产主义的内部斗争中不偏袒任何一方，而且无论如何不让它争吵张扬出去。卡斯特罗同贝内和贝内同贝内，但从来不曾对古巴公众透露过，只不过偶尔有些暗示。

在他的星期日的讲话中，卡斯特罗抛开了这一切先例。他对国内的意见不足言不详，而且丝毫打算缩小中国少数的

## 英国报刊和通讯社的评论

说卡斯特罗虽然可能保持“革命宣传”，但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比以前小了”；说美国官员对此感到“高兴”；说卡斯特罗认识到同美国“共处的必要性”

路透社二月六日华盛顿发出的报道说：

美国官员今天拒绝就古巴总理卡斯特罗对中国的攻击发表

为标题，刊登消息说：

古巴政府总理菲·卡斯特罗星期二坚决拒绝了与中国同限制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同时掀起的反古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古巴大大减少了所商定的对古巴的以糖交换的大米供应量，它在对外贸易部的一位不知名的官员的声明中解释了这一点。菲·卡斯特罗对此发表了声明：

“决不会有人相信，在中国，外贸部的一位普通的不知名的官员会发表声明，指责与它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理说……而这种声明以其政治背景和不尊敬的形式会严重损害象古巴和中国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态度已越过了只能把贸易交换数字和数据作为依据的讨论的界限。”

卡斯特罗在声明的其它部分中还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古巴散发了大量的宣传材料。古巴领导人在去年九月就指出这种行动是不能容许的，但是中国领导人对古巴的抗议不予以理睬。卡斯特罗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只有利于帝国主义敌人，鼓励它进行冒险的侵略和干涉。

卡斯特罗说，谁从中得到好处呢？帝国主义。谁是受害者呢？越南人。而谁要受国际害呢？社会主义国家的威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威望，国际革命运动的威望。

卡斯特罗把中国代表在古巴的宣传活动称作是破坏一个国家的主权的行径，指出古巴政府不愿意继续容忍这种活动。

《劳动报》二月八日发表题为《令人奇怪的俄法》的文章，摘要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突然决定，使古巴人民的供应问题受到严重威胁。古巴政府被迫把大米的高级减少一半。自然，在采取这样重大的措施时，有必要向人民解释它的原因。古巴的这种完全有理由的步骤，引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烈反应。

菲·卡斯特罗星期二日在公开演讲中反对了中国荒唐的做法和侮辱性的提法。

古巴公众的愤慨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过去其它国家——其中也有我们的共和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政策中也有不愉快的经验。如果我们意识到，这种突然的步骤在这个年轻的革命国家中引起怎样的困难的话，那么就会充分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波兰报纸发表文章

诬蔑中国做法涉及古巴“主权问题”

《华沙生活报》二月十一日就中古贸易问题发表了一篇报道，说哈瓦那记者克雷斯库斯的文章，题为《古巴——中国的争权问题》。摘要如下：

今年年初开始的古巴和中国之间围绕中国一九六六年剧烈的减少了对古巴大米供应问题的公开争论，已经明显地超过了贸易关系的范畴，而进入政治方面。星期天古巴报纸上公布的菲·卡斯特罗总理的声明表达了这样的信念，即在古巴问题上的中国决定是带有“政治背景的经济迫害”。

声明指出，这一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对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关于反对在古巴军官和当地民族机关的领导人中，大量散发中国的大臣在加深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谊的章点的强烈抗议的“回答”，这一活动是由中国方面提出的和在抗议中仍继续的。从去年三月卡斯特罗总理坚决反对对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分歧，同时他强调指出，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没有权利在古巴进行政治干预。

目前，大米问题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对中国的异常严重的指责不仅是政治团体注意的主要问题，而且也是哈瓦那所有居住民族的主要问题，因为，这涉及到基本的消费品，而且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触及的是人民特别敏感的问题——主权问题。

米、少买糖的决定可能对古巴造成的损害。

他谴责中国人在古巴军官中散发宣传品，说这种行径“同美国大使馆在中国的工作所作为一色一样”。他说，问题是，在明天的革命的世界中，帝国主义国家目前所使用的“海监、压迫和捣乱等最恶毒的手法是否还要继续存在？”

北京最近暗示苏联和美国是一条路货，但现在卡斯特罗争辩说，中国才是象美国的国家。

分析家们对卡斯特罗为什么这样做，提出了初步的假说。最简单的一个假说是，中国减少大米供应以及当海上贸易量降低使中国方面指责他说的做法，令他象跳如雷，他认为等级制度里装并没有任何意义。

另一种假说是，在苏联策划他关于加紧在拉丁美洲进行革命鼓动的计划后，也许是在取得了苏联进一步的经济援助后，他同意在古巴中国人作为解释。

第三种假说是，卡斯特罗可能计划清洗政府和军队里面他认为忠诚有问题的人。也许是在去年在同总理发生一系列分歧后从古巴消失的格瓦拉的伙计。

《纽约先驱论坛报》二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场全是共产党人演出的惊心动魄的好戏》的社论，摘要如下：菲德尔·卡斯特罗现在已经证实了许多人的猜测，要：上个月他第一次对古巴大爆发战争的原因远不是最近因食糖交换大米的贸易协定上有分歧。在哈瓦那和北京最近这个回合的唇枪舌战中，他告诉人们，真正令人心痛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试图颠覆古巴的武装部队。

卡斯特罗可能象北京指责的那样是一个说话者；但是当他指责他的前中国朋友“讹诈、勒索、施加压力、侵略和扼杀”——以前这种语言只用来骂美国——时，他不一定是在说谎。他对北京进行这种指责使人认为，共产党人也许正准备同共产党中国断绝外交关系。

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在这一场红色大卫同红色歌利亚打架的非凡好戏后面，可能还有多得多的东西。最近来自莫斯科的谣言说，克里姆林宫终于已经决定同北京作最后的正式破裂。卡斯特罗提出的对毛泽东的理由可能是为使共产党世界公开分裂成两个独立的敌对阵营作准备的。

当到了进行唱名表决来判定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问题时，古巴作为一个受大国胁迫和侵犯的小国，预计可能会将其共产党中国的同情。如果要求卡斯特罗进一步举出中国背叛的证据，他可能是能够做到的。

我们必须等待卡斯特罗在这场全是共产党人演出的惊心动魄的好戏中的下一场。

长期来，华盛顿有一种看法，即对这位古巴领导人的经济支持主要来自苏联，而他则倾向于赞成北京在支持武装革命方面采取的更为积极的方针。

这些官员私下说，对卡斯特罗来说，现在似乎已不再有必要在意识形态方面偏向北京。

《新闻日报》二月七日发表一篇社论，标题是《请中国滚蛋》。摘要如下：

菲德尔·卡斯特罗十分猛烈地攻击中国对古巴本身、对其它拉丁美洲国家和对世界共产主义都有重大意义。

（他进行这种攻击的）最明显的原因是，古巴已经决定满足拉丁美洲不要满足精神了。俄国人能提供东西，而中国人不能。随着中苏分歧的扩大，作出选择变得更加必要了。

不管他采取这个行动的原因何在，其它拉丁美洲国家呼吸起来可以轻松一些了，现在谁可能相信在他的邻国中保持他的鼓吹革命宣传。但是，现在言语之后继之以行动的可能性比以前小了。

《每日电讯报》二月八日发表题为《不聪明的中国人》的社论说：

现在卡斯特罗发表了十分厉害的古文攻击演说，把中国人骂出了古巴。他在演说中把中国人同美国人相提并论，指责他

法新社二月六日从华盛顿发出的报道说：

这里的一些共产党问题专家今天晚上对古巴总理卡斯特罗猛烈攻击人民中国并感到意外，但是他们对他指责中国同美国合谋破坏古巴经济这一完全感到吃惊。

这些专家指出，去年底，中国人同中国普通通知古巴说，它不再向古巴供应大米来换取食糖。这里认为这一行动表明两国关系越来越紧张的一种迹象，因此，卡斯特罗总理今晚激烈的演说并不完全出人意外。

但是中美关系的这种解释使他们大为吃惊，因为中国的宣传总是说华盛顿和莫斯科在反对中国利益方面有着暗中的协议。因此，谁也没有指责过美国人同人民中国一起来反对古巴。

《世界报》二月八日发表了题为《菲德尔的逻辑》的社论，摘要如下：

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对北京政府进行指责的激烈的语调可能使人感到惊讶。诚然，这位“最高领导人”一直是直言不讳而称，但是，他在此之前始终避免在使社会主义世界分裂的分歧中因此采取极端态度。

因此，应当认为，卡斯特罗出于非常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原因才作出这种可能预示着他的政府同北京领导人之间完全破裂的惊人的举动。人们甚至可以说，哈瓦那的“选择”（这种选择使苏联人有理由感到特别满意）仅仅是莫斯科和北京彻底决裂的第一个阶段。

总之，外间人士务必必须注意到，古巴总理的这次突然极端的抨击，是在苏联外长部长恰托利夫去哈瓦那访问古巴和中国和苏联之间断绝的贸易协定这件事同时发生的。

不管怎样，可以肯定，古巴经济至少在在今后若干年内要依靠苏联的巨大援助，而中国人去年九月对同古巴缔结的贸易协定提出异议特别强烈地激怒了卡斯特罗。

但是，如果把这场争吵缩小为“几斤大米之争”，那不是不了解古巴的现实情况。

这个小国对中国进行指责的真正原因是政治性的。中国人在三大会议期间在委员会内和会外进行辩论时所持的格外顽固的态度已足以使卡继续进行反对“修正主义叛徒”的宣传运动，都无疑促使了这位古巴总理决不能再容忍这种对他国家的干涉。

《美国报》二十七日以《讹诈、威逼、出卖，这是卡斯特罗攻击北京的新词汇》为题发表文章，摘要如下：

哈瓦那和北京之间为什么也没有什么可来往了。争吵的起因是两国间贸易的一种物质概念，大米。

事实上，卡斯特罗在两个共产主义之间长期动摇不定，甚至在其一个时期由于粮食供应的原由而企图使它们互相竞争，最后，他终于选择了莫斯科，这也是古巴式的选择。

## 西德报刊的评论

说卡斯特罗反华“把他自己推到了对莫斯科的更大的依附中去了”，苏联领导收回了它的“红利”

《法兰克福评论报》二月十四日社论说：

究竟卡斯特罗的这种怒气冲冲的攻击在政治上是否聪明，还要等着瞧。许多迹象表明，他还在表现出急剧改变阵线，把他自己推到了对莫斯科的更大的依附中去了。而正好是这事实，迫使拉丁美洲的许多关心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对卡斯特罗的过火信任不断增长。

《明镜》周刊二月十四日的一期载文说：

卡斯特罗的背叛北京，也非是莫斯科的压制的结果。年

## 印度尼西亚右派报纸的评论

为卡斯特罗反华叫好，认为“毫不留情地打击中国”是在维护自尊心方面的一个良好范例”

《印度尼西亚先驱报》二月九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国家组织对俄国的书刊颠覆古巴武装部队……拉丁美洲对苏联领导致美国国家组织给俄国的索卡斯特罗的革命感到不安。现在哈瓦那和北京发生不和，这应当使美国国家组织得到一些安慰》。

《美国五项原则之火把》二十七日的短评说：现在正在考虑同中国的关系。请问，如果已经考虑了，还要怎么考虑或者继续考虑呢？快点吧！俗话说：时间不等人，你知道吗？时间宝贵。

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毫不留情地打击中国。这是在维护自尊心方面的一个良好范例。

《印度尼西亚先驱报》二月九日发表社论说：我们与卡斯特罗总理有我们的分歧，特别是自从九月三十日运动发表以来

们干了各种各样背信弃义的事。所谓大米交易量减少只是争吵的一部分。这一指责的真正实质问题是中国在武装部队和官员中间流行反苏宣传从而干涉了古巴内政。

在适当衡量俄国无疑已经对卡斯特罗施加的压力后，中国人遭受这一挫折，主要是由于他们自己同别人打交道的技术手段落后。在西方，中国对古巴的挫折可能引起某种满意的情绪。

路透社二月八日从哈瓦那发出的报道说：

在卡斯特罗总理激烈攻击北京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后，这里的外文观察家猜测古巴和中国之间可能断绝外交关系。

他们说，就卡斯特罗星期二日指责中国可能颠覆古巴武装部队的声明的激烈程度来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很难找到先例。

《论坛》周刊二月十一日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古巴和共处的》社论说：

菲德尔·卡斯特罗对中国的猛烈攻击成了上周末的报纸大标题。

卡斯特罗知道，由于高弗里达只有一百九十里，共处的必要性——是根本性的。古巴曾经处在一场核交锋会造成的深渊的边缘。他们接受了教训，而中国还得接受这个教训。

这种选择是如此的热心和强烈，以致观察家们猜测，在外交上事情是否将到此为止。

卡斯特罗直言不讳：他谴责北京领导人同古巴共和国表现出“轻蔑”、“伤害”和“无礼”。

在哈瓦那的一份报纸上发表了的一大篇罪状中，“讹诈”、“威逼”、“出卖”的字眼出现了五十多次。

古巴希望什么呢？首先，除了化为乌有的革命思想外，它试图再生。同“黄种大帝国”的断绝关系到什么时候难道不会使同华盛顿恢复协议吗？

莫斯科对于所许这一切表示同意。

法新社记者多德二月七日从哈瓦那发出的报道说：

大闹问题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因为引起爆炸，使古巴政府恼火并使它公开发脾气的是，北京继续进行的毫不示弱的政治宣传。卡斯特罗抓住了这个罗辑。据卡斯特罗的声明说，去年九月十四日，多尔蒂斯总统和他本人曾要求北京立即停止在古巴军官和高级官员中散发中国的政治新闻简报和进行宣传。

观察家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位古巴领导人在“北京的帝国主义进攻”的情况下采取的态度可能进一步削弱拉丁美洲革命者的亲中国的集团。自从卡斯特罗一月十五日的讲话以来，这些革命者已成为少数派并处于守势了。那时他谴责“那些为帝国主义效劳的渣滓阶层和分裂活动代理人”。可以说这是对北京的影射攻击。今天的攻击是正面的。

《费加罗报》二月八日发表了该报驻纽约特派记者造成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菲德尔·卡斯特罗对中国共产党政府“出卖”的公开谴责以及哈瓦那和北京之间出现的实际上已决裂在国际外交人士中引起巨大震动。

但是，不管菲德尔·卡斯特罗个人愤怒的原因是什么，一般而论，应该承认，他的政权的经济生存由于完全依赖莫斯科，以致他可能没有克里姆林宫的同意下就按他已做的那样在讲话中对中国进行谴责。

从而得出结论，即事实上卡斯特罗的所作所为是为莫斯科打算的，而在这之间，即使有一步之差，许多人已经跨过了这一步。无论何如，华盛顿是高兴地看到哈瓦那谴责莫斯科“对小国进行讹诈、威逼、压迫、侵略和扼杀”，尽管卡斯特罗还说，共产党中国的做法是无效的“修正主义”。

但是，如果哈瓦那和北京之间的决裂是一种预兆和信号，即是说如果这种决裂标志着苏联和中国所领导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决定结束和正式地把毛泽东在中国开除出共产主义大家庭，那么，古巴昨天的谴责将真正形成不是对古巴来说，而是对世界来说是一个历史转折点。

## 西德报刊的评论

说卡斯特罗反华“把他自己推到了对莫斯科的更大的依附中去了”，苏联领导收回了它的“红利”

《法兰克福评论报》二月十四日社论说：

究竟卡斯特罗的这种怒气冲冲的攻击在政治上是否聪明，还要等着瞧。许多迹象表明，他还在表现出急剧改变阵线，把他自己推到了对莫斯科的更大的依附中去了。而正好是这事实，迫使拉丁美洲的许多关心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对卡斯特罗的过火信任不断增长。

《明镜》周刊二月十四日的一期载文说：

卡斯特罗的背叛北京，也非是莫斯科的压制的结果。年

《印度尼西亚先驱报》二月九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国家组织对俄国的书刊颠覆古巴武装部队……拉丁美洲对苏联领导致美国国家组织给俄国的索卡斯特罗的革命感到不安。现在哈瓦那和北京发生不和，这应当使美国国家组织得到一些安慰》。

《美国五项原则之火把》二十七日的短评说：现在正在考虑同中国的关系。请问，如果已经考虑了，还要怎么考虑或者继续考虑呢？快点吧！俗话说：时间不等人，你知道吗？时间宝贵。

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毫不留情地打击中国。这是在维护自尊心方面的一个良好范例。

《印度尼西亚先驱报》二月九日发表社论说：我们与卡斯特罗总理有我们的分歧，特别是自从九月三十日运动发表以来

度将发生改变。

卡斯特罗把中国代表在哈瓦那所使用的方法同美国大使馆当时——如他所说的——“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相比。这一对比也足以说明为什么中美关系的气氛发生了巨大变化，也足以说明为什么北京去年在外交上和政治上遭到一系列失败以及为什么大量的亚非国家对外交哈瓦那现在所说的同样情况——中国企图干涉他国内政——发出了警告。

《共产主义世界》周报二月十日以《对古巴的压力》为题发表了一篇短评，评论在附和卡斯特罗攻击中国干涉古巴内政的违法行径说：

这种状况本身就是一种以说明，中国企图进行干涉和对古巴政府施加压力，严重损害了古巴革命。但是，显然，这次比前某些情况要更清楚和更突出得多地表明，中国不能不承认同其他国家在对华关系中努力保持独立自主的和平等的伙伴的身份。

